

“做功利上不讨好、学术上意义大的事”

——对话南炳文

书房主人：

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南炳文，1942年1月生，河北广宗人。中国明史学会前会长，现任中国明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天津文史馆馆员、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及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承担、主持“二十四史”点校本之《明史》修订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工程等基础性资料建设工作。

著有《明史》(合著)、《南明史》《明史新探》《明代文化研究》(合著)、《清代文化》(合著)、《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等论著30余种。

南炳文的书房

南炳文的书房就是他埋首历史研究的办公室，一处位于南开大学范孙楼内，另一处，也是他现在主要使用的书房，位于廊坊师范学院的图书馆一层最内侧。

屋中布置简单，几个办公柜，几张办公桌。桌上布满高高摞起的各类工具书，各种字典、词典和历史典籍。南炳文工作的桌子面朝南，对着半掩窗帘的窗户，阳光每天随时在桌子上移动，南炳文和他那把最常见的黑色折叠椅也随之挪动，躲到太阳晒不到的位置。

校领导几次提出要为他更换桌椅摆设，他回回都拒绝，说自己现在就很好，“乱中有序”，他开玩笑说自己的两个书房是一个风格，“乱七八糟”。

“我这条件够好的，用书很方便，常用的书在这边，另一部分在对面。”对面房间是他的学术助理王雅洁的办公室，里面像图书馆，几排书架上摆着3000多册的“文渊阁”及“续修”《四库全书》(其他《四库全书》在另外书房存放)和几种大部头的地方志。

有排书架从上到下摞着一沓沓已完成修订的点校本《明史》清样印稿，十余年修史光阴凝聚其中。

南炳文书房中的所有书籍，无一例外与其修史校勘工作相关，包括《褚遂良书法精选》也并非用以欣赏书法，而是帮助对照辨认明清时期手抄本中难以辨识的草书。



崔岱远

要想在京城里找到老书铺的影子，那就得从和平门奔南，沿着南新华街路东走上不远，您就能钻进号称是京城最长的书店——由一连串书铺组建成的“中国书店”了，这些店铺门脸都不太大，说不上华贵，可也并不寒碜，带着那么点儿旧皇城的老气派。别看这溜店铺进深不深，而且宽宽窄窄，可您沿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书架子往前走，足可以走上一两里地远，一直走到琉璃厂的海王村，这简直就是一条书籍的长廊。

我上中学的三十一中离此不远，那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下学之后到这儿来逛书店、淘旧书，欣赏那些木头书架子上各个时代的诸多版本，享受那静静的书香雅韵。从黄昏到傍晚，直到书店关门上板儿，才依依不舍坐上公交车回家。

“淘书”之乐

所谓“淘书”并不是简单地买书，淘书的乐趣在于，像淘米一样以平和舒缓的心态从浩如烟海的旧书黄卷堆里遴选出自己得意的珍品，甚至只是那几片发黄的残页。

淘书者有时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苦觅，可有时又是并无直接目标的邂逅。或欣慰、或惊艳、或惋惜、或怅然，千般情感就产生于手指与微黄纸张那轻轻碰触之间。

蓝布函套，享受带着吟味儿的书卷气。可若论真了说，中国书店的历史并不太久，正式挂牌不过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然而，它又的确与老北京的古旧书行一脉相承，并把这一行当独有的经营文化像化石一样保存下来。因为，中国书店实际上正是老北京几乎所有古旧书铺公私合营的产物。

从南新华街到琉璃厂

历史上京城并没有综合性的大书店，有的只是两三间门脸儿的小书铺，而且数量也不太多，连书摊儿都算上，全市也就百十来家。能雇上两三个伙计的书肆算是大户，更多的是根本没有伙计的连家铺子——前面一间房摆上两架子旧书，再摆上一桌二椅供顾客歇脚，一掀门帘子，后面就是他们家了。不过别看数量少、店面小，可整个行业在京城的生意场上那是数得着的行当。一来是因为这些书铺都扎堆儿在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像东安市场、隆福寺、西单。更重要的是，小书铺的顾客却常常是社会上的大人物，要么是有头有脸的文化名流，要么是宦游回归的显贵达官。这一特色也传承了几百年，特别是南新华街到琉璃厂一带的老书铺，那得说是连接着京城的久远文脉。

明代的书肆原本都在内城。到了清代旗民分城而居，内城住的是尚武好玩儿的八旗子弟，舞文弄墨的汉族文人大多住在宣南，专门接待各地举子的会馆也在这附近。渐渐地，琉璃厂一带形成了京城最大的文化附近，字画店、南纸店、刻字铺、古玩行等一一应俱全，而其中数量最多的就要数一家家大大小小

本报记者王京雪

治学不求甚解，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

草地：书房是您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您在这一天通常如何度过？

南炳文：我比较规律，一般6点半到7点起床，8点10分左右到这儿开工，干到中午11点40分，闹钟响了。正常的话，12点到家，吃完饭午休5到10分钟，我是躺下就能睡着那种人，这样下午1点来钟回到这里接着干。下午6点40分，闹钟一响，争取7点到7点半回家，晚上处理可以在家做的事，比如写个信之类。处理完，11点多睡觉。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修订》，基本就在这间屋子里做，因为这边用书方便。《明实录》1600多字，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就像大事记一样，校勘必须要看更多原始资料，没书的话寸步难行。

草地：您的读书经历和最终选择明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缘分是怎样的？

南炳文：我爱读书很早，小时候就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各种小说。我爸爸是兽医，希望我将来也当兽医，有个谋生之道，就让我读些《元亨疗马集》一类的医典，但我真不感兴趣，自己在屋子里，有大人进来了，才赶快抓起来看两眼。

1961年我参加高考，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那时，我对历史这门学问还不很了解。南开有一批著名历史学家，在那样的学术氛围中，我很快发现历史跟中学时的死记硬背很不一样，你要做研究，要创新，那我创什么新？

得知明清史是南开最有优势的学科，明清史研究室是南开甚至全国明清史研究的高地，领导该研究机构的郑天挺先生又是史学界最有成就的权威学者之一，让我对从事明清史研究产生了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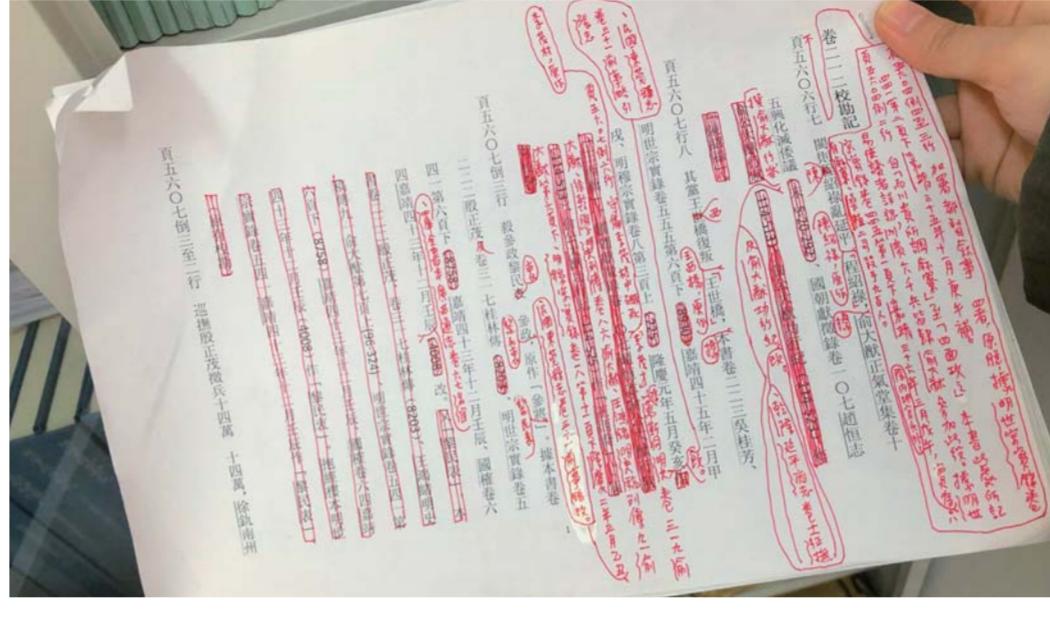
1962年，我大二时，听老师王文郁说，清史方面已经有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而明史方面还没有今人部头章节体断代史专著，于是，我立下志向，要填补这个空白，写一部大部头的断代史明史，从此开始整天读明史相关的书籍，这是影响我一生的事情。

草地：萧一山写《清代通史》也是因为中学时读到日本史学家的清史著作，认为国人应该自己研究中国史，从此以写清史为目标，上大学后废寝忘食苦读，与您20岁立志写明史的经历有点相似。

南炳文：不太一样，我不是因为读了他的书，而是决定在明史清史中选一个方向写书时，发现清朝已经有人写过了，于是就决定做明史。

定下目标后，我立刻开始阅读有关著作，要求自己门门功课之余，所有时间都用在看明史上。还买了张中国地图，一个省、一个省剪下来，读书时，读到哪个省，就把对应那片拿出来，学历史，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地理概念，是最基本的，必须弄清楚。所以我当时读书必带地图，再必备两大本《辞源》，遇到不懂的字，立刻就查，再背几本《明史纪事本末》细读。你看，我现在手边也常放着《二十史朔闻表》，这个是用来推算时间的工具书。

遇到天文、地理、时间等各种问题，都立刻去查去解决，必须想办法弄明白，治学，如果有没弄



▲南炳文经手过的书稿。

本报记者王京雪摄

清楚的地方，就无法连贯。遇到问题，不求甚解，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

草地：那么年轻就立下宏志，听说您当时也是废寝忘食，以刻苦闻名，吃完饭被问吃了什么都想不起来，并且一直坚持这样苦读，不会感到疲惫吗？

南炳文：一般都感觉不到，就是一种求知欲，在那儿引着你，你就放不下书，一个问题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你就放不下。这个地名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物究竟怎么样？这里涉及的词是不是有典故？一定要查清楚了才放得下。

“史籍整理，在功利上不讨好，但学术上意义极大”

草地：1979年，您得到了撰写大部头断代史明史的机会，完成这一大学时立下的目标后，您的学术方向转移到史籍的点校整理上，这一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南炳文：对，当时受出版社邀约和汤纲先生合作撰写《明史》，1985年出版了上册，1991年出版下册，另外我写的南明部分，又另行出版了《南明史》。

做完《明史》后，我一直在思考接下来做什么，有两个方向可选择：一是聚焦比如法律、经济这样的一个方面，沿一条线深入做下去；还有一个是为史学研究做些更基础的原始材料整理工作。我感到做某一方面的明史研究，也是贡献，但做基础性的史籍文献整理贡献更大，可以给明史研究的方方面面提供基础，供千万人使用。

于是，我开始对一些大部头的基础性文献进行整理校勘和修订，用10余年时间将存于国内外的《万历起居注》残本进行辑校补正，基本恢复其原貌，又对仅存于日本的《泰昌起居注》《天启起居注》进行校勘整理引进。

2007年，我主持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的修订。2013年底，又开始了《明实录》的校勘与研究工作。

草地：在高校学术评价制度里，比起史籍整理，更看重专著和论文。包括您整理《万历起居注》时，听说也受过劝告，说从经济效益上说，不如只原样影印，不必耗费精力去校勘整理。您有没有担忧过肯坐冷板凳的人少了？

草地：在高校学术评价制度里，比起史籍整理，更看重专著和论文。包括您整理《万历起居注》时，听说也受过劝告，说从经济效益上说，不如只原样影印，不必耗费精力去校勘整理。您有没有担忧过肯坐冷板凳的人少了？